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4.06.001

调查研究与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

尹旦萍,李桂阳

(华中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妇女解放是毛泽东的政治理想,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把握中国实际的基本方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探索中国妇女解放道路,他对妇女群体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他加深了对妇女问题的认识,提出了妇女解放的理论、道路和行动方案。一是发现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是束缚中国妇女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建构了中国妇女受压迫的解释体系;二是发现阶级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前提,开创了把妇女运动纳入阶级解放中、通过阶级解放推进妇女解放的独特道路;三是看到中国妇女在革命和生产中的巨大贡献,提出“中国妇女具有伟大的力量”,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认识论;四是认识到旧婚姻制度让妇女深受其害、妇女热切向往婚姻自由,提出把婚姻自由作为妇女解放的重点。这些理论和主张形成了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迈出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第一步。因此,调查研究是毛泽东通晓中国妇女实际的桥梁,是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形成的基础。

关键词: 毛泽东;调查研究;妇女解放;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24)06-0001-08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一贯身体力行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方法论基础。毛泽东开展调查研究的视域十分宽泛,包括阶级状况、经济生活、政治态度、社会性别、生活方式等。长期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维度对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展开了研究,形成了丰富且极富创见的成果^①。然而,他关于妇女问题的调查研究,目前仅有少数学者进行了简单梳理^②,学术界的关注还远远不够。本文着重考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关妇女调查研究的文本及实践,梳理他在调查中发现的有关妇女的信息,分析他将这些信息归纳提炼、转化为决策政策、升华为思想理论的内在逻辑,以期更好地理解调查研究在毛泽东妇女思想形成、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中的作用。

一 妇女问题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指出:“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③妇女在社会革命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革命离不开妇女;妇女地位高低精确反映了社会文明程度,妇女是观察社会的一扇窗口。毛泽东十分重视妇女问题,在调查中国国情、思考中国革命道路时,自觉将妇女纳入调查对象,开展了对妇女问题的调查研究。

(一) 妇女解放是毛泽东的理想

毛泽东之所以关注妇女解放问题,与其个人性格、成长经历和特定的社会背景有着紧密联系。从个人层面看,毛泽东从小就有体恤贫弱的独特个性,对妇女的遭际寄予深切同情。在《祭母文》

收稿日期:2024-09-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22FDJA002)

作者简介:尹旦萍(1973—),女,湖北恩施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党的妇女工作和婚姻家庭建设研究。

①李维武:《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与“实践论”哲学体系的创立》,《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②代表性论文包括:张雪英:《才溪乡妇女的奉献精神——纪念毛泽东〈才溪乡调查〉70周年》,《龙岩师专学报》2004年第1期;钟军:《从苏区时期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看苏区妇女解放》,《党史文苑》2017年第16期;张珊珊:《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妇女解放思想》,《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0页。

中,他回顾母亲一生“摧折作磨……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①。他的母亲是中国亿万妇女的缩影,从她身上,毛泽东看到了中国妇女群体的命运。黑格尔指出:“我们对历史最初的一瞥,便使我们深信人类的行动都发生于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兴趣、他们的个性和才能。”^②毛泽东慈悲为怀、同情贫弱的性格特征,妇女的悲苦人生在他心中留下的烙印,是他日后关注妇女问题、追求妇女解放的朴素动力。

从社会层面看,一批先进人物从国际比较视野思考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时,意识到中国既有的男尊女卑性别文化不仅导致妇女地位低下,而且还严重影响民族尊严和国家命运,由此提出妇女解放议题。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拥戴新文化的代表人物们一致认为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妇女解放遂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这些新鲜讯息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深刻影响,妇女问题开始进入他的理论视域。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党的领导人后,毛泽东在擘画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蓝图时,自觉将妇女解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维度,确立起了妇女解放的政治理想。

(二)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认知中国国情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针对党内脱离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严重错误,深刻认识到“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③。要找到革命的正确道路,必须破除教条主义的藩篱,认清中国国情,而调查研究是通晓中国国情的基本途径。他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④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活动,其中就包括对妇女问题的调查。

(三) 毛泽东对妇女问题的调查研究方式

毛泽东对妇女问题的调查研究包括三种方式:一是直接调查。1927年1月,他在湖南调查农民运动期间,多次视察女界联合会,邀集妇女工作的负责人访谈,了解妇女在革命中的表现。在寻乌调查中,“土地斗争中的妇女”是调查的一个纲目。在东塘等地,他调查了妇委的设置状况;在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中,他对妇女在政治、生产、军事等方面的表现均进行了深入调查。二是间接调查。作为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日理万机、南征北战,戎马倥偬,亲自去基层调查研究的时间精力毕竟有限,书报信息、各地各部门的报告,以及指示或委托其他组织开展调查得到的第二手资料,都是他调查研究进而建立起关于妇女知识体系的重要方式。比如,1932年6月,毛泽东指导中央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制作两种调查表,在福建和江西下发,收集相关信息;1941年9月,他指示中央妇委组建妇女生活调查团,深入基层调研,并亲自为他们作“关于农村调查”的辅导报告,这些间接调查也构成他了解中国妇女实际的重要来源^⑤。三是个人经历和生活观察。毛泽东在家庭生活、社会交往和革命工作中,参与观察得到的真实信息、形成的亲身感受,也成为他了解妇女情况的重要补充。通过这些调查,他了解了中国妇女的实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与中国妇女实际相结合,提出系列理论、主张和政策,形成妇女解放思想。

二 发现中国妇女受到压迫的双重原因

妇女受压迫的根源问题是妇女解放的元问题,对妇女受压迫原因的追问,是所有妇女解放理论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⑥人的社会关系包括阶级关系、性别关系、种族关系、民族关系等,只有从关系网络中,才能理解现实的人的境遇。在世界妇女解

①《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4页。

②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⑤万军杰,王文浩:《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妇女政策的变化与调整》,《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

放思想史上,由于世界观方法论和社会语境的差异,以及妇女问题本身的极端复杂性,不同学派从不同视角出发,对妇女受压迫原因作出了不同解释。西方女权主义从性别关系出发解释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如自由主义将其归因于权利不平等,精神分析学归因于两性性心理的差异,存在主义归因于男性中心文化;马克思主义从阶级关系出发,认定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罪魁祸首^①。毛泽东则从阶级关系和性别关系的双重视角去调查研究中国妇女受压迫的原因。

(一) 妇女作为农民所受到的压迫

在阶级社会,阶级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锁定了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为了弄清农民的生活状况,他提出要“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挽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②。通过调查,他发现政权、族权、神权是农民阶级痛苦的主要来源。妇女作为农民中的半数群体,政权、族权、神权对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农民同样形成普遍性压迫,阶级压迫是超越性别的结构性压迫。

(二) 妇女因为性别受到的压迫

性别关系也构成人的基本属性、规定着现实的人的本质。毛泽东通过调查发现,在中国农村,妇女除了与男性共同承受上述势力的压迫,还受到来自男性的控制。

性别分工是考察性别权力关系的重要视角。恩格斯就是从家庭性别分工考察妇女地位演变过程的。他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妻子家务劳动的价值被贬低、丈夫谋取物质生活资料的价值被重视,是文明时代性别等级产生的根本原因,指出“现代的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③。毛泽东也对寻乌的性别分工模式进行了重点考察,指出:“寻乌的女子与男子同为劳动的主力。严格说来,她们在耕种

上尽的责任比男子还要多……加以养育儿女是女子的专职,所以女子的劳苦实在比男子要厉害。她们的工作不成片段,这件未歇,那件又到。”^④妇女既部分参与了劳动生产,又承包了家务和育儿工作,工作总时长要远远高于男性,在物质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中都作出了贡献。根据唯物史观,妇女理应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然而,事实上,“她们是男子经济(封建经济以至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品。男子虽已脱离了农奴地位,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⑤。妇女在物质资料生产上的贡献未被认可,究其原因,就是男权的深度介入导致的,他由此慨叹“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⑥。

通过调查,毛泽东发现中国妇女问题的复杂性,中国妇女遭遇的不是单一的性别压迫或阶级压迫,而是一个多元混杂的压迫系统,既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体系、复杂多样的民间信仰文化、宗族治理下的乡村秩序,还有男尊女卑的性别差序。这四种权力纵横交错、相互缠绕、彼此借力,联动形成一种系统性的力量,将妇女紧紧羁缚。西方的性别归因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在中国语境均不具有理论的阐释力,中国需要有自己的解释体系。据此,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男子一样普遍受到政权、族权、神权的支配,但女子还要受夫权的支配。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妇女的“四条极大的绳索”^⑦,由此他建构了中国妇女受压迫的精准解释体系。这一理论克服了西方女权主义简单归因的局限,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妇女事业的谋篇布局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

三 发现阶级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前提

在提出“四条绳索”理论后,毛泽东对四种权力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在湖南农民运动中,凡是农民运动高涨、地主政权被推翻的地方,族长及祠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75—76、178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5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240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吞祠款,残酷的族规家法也不敢启用了;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被打破了。各地都在进行推翻神权、破除迷信的活动,农民协会占了神的庙宇做会所,庙产用于农会经费或办农民学校;人死后,敬神、做道场、送大王灯的很少了;北三区龙凤庵农民和小学教员,砍了木菩萨煮肉吃,南区东富寺三十几个菩萨都给学生和农民烧掉了;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和妇女,青年和壮年农民都不信了。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跟着动摇起来^①。在长冈乡,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老婆太敬神(装香供饭、求神拜佛)的完全没有了……迷信扫除得这样快的原因:打了土豪,分了田地”^②。

这说明,“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③,“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要是地主的政治权力破坏了的地方,农民对家族神道男女关系这三点便开始进攻了”^④。也就是说,压迫妇女的四种权力不是平行关系,而是以政权为核心组织起来的权力系统,其他三种权力都是依附于政权而存在的。只要推翻了地主政权,其他三种权力就会土崩瓦解,束缚妇女的绳索也将迎刃而解;妇女解放要从推翻政权的阶级解放做起。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语境下,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关系是必须厘清的一对重大关系。毛泽东对二者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认为:“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⑤他认为的社会解放,就是指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解放。在内容上,妇女解放运动是阶级解放运动的一部分,阶级解放运动包含着妇女解放运动;在位阶上,阶级解放高于妇女解放,阶级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前提条件。这是对特定中国语境下妇女解放条件的理性分析。

综合以上发现,毛泽东认为,西方以妇女为行动主体、以男性为斗争对象、以伸张妇女权利为目标的妇女运动道路,马克思主义通过社会变革、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实现妇女解放的道路,都不能简单照搬到中国,中国应从实际出发,选择自己的妇女解放道路。根据“四大绳索”理论、阶级解放是妇女解放前提的判断,中国妇女解放的出路应先从阶级解放做起,以阶级解放开路,再斩断其他三条绳索,最终解除“四条绳索”。他提出把妇女解放运动纳入社会革命的洪流、通过阶级解放推进妇女解放的道路,即以阶级解放的宏伟使命引领妇女运动、在阶级解放过程中实现妇女解放的道路。这一道路选择,既体现了对妇女解放规律的尊重,也充分考虑了中国语境中妇女解放的可行性,不仅成功引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也为人类妇女解放贡献了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

四 看到中国妇女具有伟大的力量

妇女是否有力量,决定着妇女解放的基本逻辑。如果妇女有力量,那么妇女的弱势地位就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妇女解放就是对妇女力量的正当报偿,是对性别不公的纠偏补正。如果妇女没有力量,妇女的弱者地位就是本质主义的产物,妇女解放就不是靠妇女自身实力争取得来,而是其他主体对妇女的人道恩典。因此,中国妇女是否有力量,就关系到妇女能否成为自身解放主体的问题,涉及为什么要实现妇女解放的问题。

在把妇女运动纳入阶级解放这一道路指引下,毛泽东动员广大妇女走出家庭,参与革命事业。在他的动员下,亿万妇女以空前热情投身到革命浪潮之中。在调查中,毛泽东看到了妇女在各条战线上迸发出的巨大能量。

(一) 妇女是革命的重要力量

在湖南农民运动中,衡山白果的妇女,冲破了妇女不入祠堂、不吃酒的禁忌,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⑥,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3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3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勇敢地向族权、夫权宣战。在寻乌,妇女果敢地参加土地革命斗争,四军二纵队攻打篁乡反动炮楼时,篁乡的妇女们成群地挑柴去烧炮楼,又从反动地主家里抢了谷子出来^①。在长冈乡,16—45 岁的健康妇女全员参加地方武装,连长、副连长、政治指导、排长、副排长、班长、副班长皆由妇女担任。她们平时以村为单位进行简单地训练,战时紧密配合主力红军,当短夫、组织救护排、洗衣队、站岗放哨、传递情报^②。才溪乡妇女积极投入扩大红军的工作,3 个月内动员 125 人参加红军,为前线提供布草鞋两千多双^③;东塘的妇女也组织起了赤卫队、慰劳队、洗衣队^④;兴国县红军陈侦山的妻子担任了当地女赤卫队队长^⑤。广大妇女成为革命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革命能量。

同时,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结识了一批优秀的女革命者,如他的两任妻子杨开慧、贺子珍,妹妹毛泽建,革命战友向警予、蔡畅、邓颖超、曾志、康克清等。在与她们并肩战斗、精诚合作中,他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她们,感受到了她们的顽强意志和伟大力量。

(二) 妇女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

如前所述,在寻乌的性别分工格局下,妇女既深度参与农业生产,又承包家务劳动。在其他苏区,随着大量男性上前线作战,妇女义不容辞地接替了此前由男性承担的农业生产任务。在长冈乡,留守村中的男性仅 87 人,妇女为 326 人,是男性的 4 倍。妇女们学习犁耙,成群地进入生产战线,破除了长期以来“女人耕田要遭雷公打”“妇女蒔田禾不长”的迷信。在实现扩军的同时,生产不减反增,得力于妇女在生产中的贡献^⑥。在上才溪乡,留守村庄的女劳动力为 559 人,男劳动

力仅 69 人;在下才溪乡,留守村庄的女劳动力为 435 人,男劳动力仅 232 人。300 多位妇女学会了用牛耕地,60 多位妇女会蒔田。为增加耕地,妇女们积极开山,“开山开得女同志‘争’起来,我要开,你也要开”,发起了劳动竞赛。土地革命前,才溪区粮食远不够吃。革命后,粮食已有余^⑦。妇女及时挑起农业生产重任,农业生产不仅没有耽误,产量反而明显增加。

(三) 妇女是政府组织中的新生力量

在苏维埃政府中,妇女也崭露头角,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长冈乡成立了女工农妇代表会,扩红委员会 7 名成员中有 5 名是妇女,乡宣传队中妇女占十分之六^⑧;榔木乡选举出了女代表 16 人,其中 8 位“寻工作做,又做得好”,表现非常突出^⑨。在上才溪乡,一年多时间内妇女代表占比从 30% 增长为 60%,下才溪乡的妇女代表占比从 30% 增长为 65%。妇女代表会十天召开一次,组织妇女讨论并宣传慰劳红军、推销公债、发展生产、婚姻问题等事宜^⑩。

通过社会调查,毛泽东看到了妇女在不同场域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对妇女的力量给予高度赞美:在湖南农民运动中,“妇女尤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不可不加关注”^⑪;在中央苏区,“在查田运动等各种群众斗争上,在经济战线上(长冈乡是主要依靠她们),在文化战线上(许多女子主持乡村教育),在军事动员上(她们的扩大红军与慰劳红军运动,她们的当短夫),在苏维埃的组织上(乡苏中女代表的作用),都表现她们的英雄姿态与伟大成绩”^⑫;在抗战中,“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抗战胜利之时”^⑬;在后方生产中,“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⑭。他将在调查中得出的结

①《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40 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91—293 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29—332 页。

④《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59 页。

⑤《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90—191 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01 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30—332 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87、318 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82 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25、329 页。

⑪《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80 页。

⑫《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4 页。

⑬《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33 页。

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61 页。

论推广到总体,上升为一般规律,认为“女子的力量也是很大的。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子参加,就做不成气。……无论什么事情,没有女子,都绝不能成功”^①。从“伟大”“没有……就”等极具张力的修辞,足见毛泽东对妇女力量的由衷赞誉。

中国妇女具有伟大的力量,这一认识论在妇女解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指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②,强调物质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是决定历史进程的关键要素。他在考察家庭的起源时,认为人类从野蛮时代起,就依据生理特征形成了男性负责物质资料生产、妇女负责家务劳动的分工模式。在这一分工模式下,妇女对物质资料生产没有贡献;至于妇女在人自身的生产中的作用,他尚未来得及深入探讨^③。因此,妇女在两种生产中的作用均未被看见。在中国思想史上,男性精英眼中的妇女是无能的,如梁启超指出“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④,妇女是国家羸弱的重要原因,是传统性别秩序的无辜受害者,是社会发展的消耗性因素,是需要男性精英关怀、改造和救赎的被动客体。毛泽东通过社会调查,用活生生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妇女具有伟大的力量,极大地拓展了对妇女能力的认知,颠覆了中国文化关于妇女的刻板印象和固有偏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中国语境中的妇女解放提供了强大的立论基础和政治伦理正当性。

五 认识到婚姻自由是妇女解放的重点

毛泽东曾亲身经历包办婚姻的切肤之痛^⑤,

对婚姻自由心驰神往。在新文化运动中,改革婚姻制度、主张婚姻自由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热门话题,也激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共鸣。在妇女调查中,婚姻自由便成为他的一个重要观察点。

(一) 妇女是旧婚姻制度的最大受害者

1919年11月14日,长沙赵五贞女士因反抗父母包办的婚姻,自杀于花轿中。身在长沙的毛泽东详细调查了解此事经过,得知赵五贞曾对婚事表达了强烈不满,提出延期请求,被夫家兄嫂以“择吉已定”的理由拒绝;出嫁当日,她不肯上轿,父亲掌他一个嘴巴。万般屈辱绝望之下,她遂以自杀决绝抗争。赵女士的死让毛泽东深切感受到包办婚姻对妇女的深重伤害,他连续写下10篇文章,激烈声讨“万恶”的婚姻制度^⑥。

在兴国,童养媳、买卖婚姻现象普遍存在。在他调查的8个红军中,温奉章的妻子16岁,陈侦山三弟的妻子9岁,钟得五侄子的妻子9岁。娶一个妻子花费200元左右,几乎等于中农的全部家产^⑦。强迫婚姻、打骂妇女在各地还很普遍,许多政府人员在婚姻问题上采取压迫干涉的手段,以至于在兴国、龙沙、上社等地,妇女因得不到婚姻自由及遭政府禁闭毒打,无法抵抗,起而毒死丈夫的事件发生^⑧。从这些现象中,毛泽东看到了旧婚姻制度与夫权、政权、族权合谋,“野蛮到无人性,女子所受的压迫与痛苦,比男子更甚”^⑨,对旧婚姻制度下妇女的苦楚寄予深切同情。

(二) 妇女热切向往婚姻自由

毛泽东发现,婚姻自由是妇女参与革命的动力来源之一,“妇女在土地斗争中是表现非常之喜欢的,因为可以解决她们没有人身自由的束缚。未结婚的青年群众中,差不多不论哪个阶级都拥护婚姻自由的口号”^⑩。妇女们希望通过土地斗争推翻封建政权,进而推翻旧婚姻制度,获得婚姻

①《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5—178页。

④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卷1)》,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8页。

⑤根据毛泽东的自述,14岁时,父母作主为他娶了一位20岁的女子,可他从来不承认这位妻子,他们也没有一起生活过。参见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6—388页。

⑦《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8—192、217页。

⑧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页。

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243页。

自由。获得婚姻自由,是驱动她们拥护并投身土地革命的内在动力。

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农民代表大会放宽了离婚的条件:承认一方有疾病的、妇女受压迫的、夫妻反目分居半年的、丈夫外出一年无消息的,均准予离婚;对方为地主阶级的,可无条件要求离婚;禁止捉奸。这些新规卸掉了妇女们身上的枷锁,为摆脱不幸婚姻提供了制度空间,受到妇女们的热情欢呼和积极响应,她们“立即有了个人的自觉”。一是以离婚方式解除没有爱情的婚姻。乡苏维埃政府每日接离婚案子数起,90%是女方主动提出离婚。二是自由恋爱成风。在南半县,部分妇女在山上与邻乡男性青年自由恋爱。有群众前去“捉奸”,反对“捉奸”的群众就前去干涉,差点导致两乡间发生械斗。有的妇女甚至选择了为爱私奔,城郊的一个乡就跑了十几位,她们的老公跑到乡苏维埃去哭诉。毛泽东发现,婚姻自由的风气“一经发动,就如水之就下不可制止”^①。这说明,婚姻自由契合了妇女的心声,她们勇敢冲破旧婚姻制度的束缚,大胆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表现了势如破竹的斗争精神,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婚姻革命浪潮。

寻乌的调查表明,妇女是旧婚姻制度的最大受害者,也是婚姻革命的勇猛实践者,她们热切期盼婚姻自由,奋力争取婚姻自由。毛泽东认识到,将妇女从旧婚姻制度中解放出来,实现婚姻自由,既是妇女解放的重点,也是撬动妇女主动性积极性的重要支点。他以婚姻自由为切入点,推动妇女解放进程。

1931年11月,毛泽东亲自签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一条即是“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主张婚姻自由的法规,毛泽东对这部法律给予极高的评价:“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数千年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了适合人性的新规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②经过两年多的实践,中央苏维埃政府对有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于1934年4月正式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婚姻自由得到更高层级的法

律保障。至此,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包办婚姻制度在苏区正式宣告结束,婚姻自由从一种理想变为现实,妇女也成为自己终身大事的主人,这一历史性变革意味着中国妇女在解放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结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对妇女问题的调查,发现中国妇女受到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的系统性压迫,提出“四大绳索”是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建立了中国妇女受压迫的解释体系;发现政权在四种压迫力量中居于核心地位,提出阶级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前提,开辟了把妇女运动纳入阶级解放的宏大叙事、通过阶级解放推进妇女解放的独特道路;看到妇女在革命和生产中迸发出巨大能量,提出“中国妇女具有伟大的力量”的妇女认识论;认识到包办婚姻对妇女的伤害、妇女渴望婚姻自由,把婚姻自由作为妇女解放的重要切入点。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③毛泽东的妇女解放思想,正是从调查研究中来、从社会实践中来。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发现了中国妇女境遇的复杂性、中国妇女自身禀赋的独特性和中国妇女的具体诉求愿望,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把关于妇女的信息进行思维加工,得出对中国妇女解放的规律性认识或理论,提出了契合中国妇女实际的道路和行动方案,进而形成了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因此,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正是从调查研究中来,从中国妇女的实际中来。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形成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桥梁,是选择中国式妇女解放道路的主要依据。

毛泽东对妇女问题的调查研究,已是近百年前的历史事件。今天,社会调查理论和方法的发展都已超越毛泽东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社会调

①《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243页。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7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

查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工具,成为严谨的现代科学方法。我们再次重温这些历史,既是为了铭记这段峥嵘岁月,回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逻辑,更是为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弘扬唯实求真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承继他躬身向下、脚踏实地、深入田野“每事问”的工作态度和方法。毛泽东强调事物是运动着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①。毛泽东奠定了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基本框架,在历史提供

的可能性内,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妇女解放。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新的实践,始终坚持守正创新,把毛泽东首创的妇女解放事业坚持好、发展好,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但是,妇女解放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妇女解放仍然面临着新旧叠加的重重困难和挑战,尤其需要发扬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立足中国妇女实际,构建起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Survey Research and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Thought on Women's Emancipation

YIN Danping & LI Guiyang

(School of Marxism,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Women's liberation was Mao Zedong's political ideal, and research was his basic method of grasping China's reality.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oad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China, he conducted in-depth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women. Through his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he forme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women's issue and put forward the theory, path and programme of action for women's liberation. Firstly, he found that the “four great ropes” binding Chinese women were regime, ethnicity, divinity and husband's right, and constructed an explanatory system of Chinese women's oppression. Secondly, he found that class emancipation was a prerequisite for women's emancipation, and created a unique path of integrating women's movement into class emancipation, and of advancing women's emancipation through class emancipation. Thirdly, he saw that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women in the revolution and production in China had been greatly reduced. Seeing the great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women in revolution and production, he proposed that “Chinese women have great power” and developed the Marxist epistemology of women, and fourthly, recognizing that the old marriage system had caused great suffering to women and that women longed for the freedom of marriage, he proposed that the freedom of marriage be the main focus of women's emancipation. These theories and propositions formed Mao Zedong's thought on women's emancipation and took the first step towards the Sinicisation of Marxist women's theory. Therefor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was the bridge for Mao Zedong to understand the reality of Chinese women an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on women's emancipation.

Key words: Mao Zedong; research; women's emancipation; sinicisation of Marxist women's theory

(责任校对 徐宁)

^①《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